

社会认识层次性与图书馆的本质论析^{*}

周文杰

摘 要 谢拉等学者提出和发展的社会认识论是一种旨在从知识交流角度解析“社会智力”的形成机制,从而为图书馆情报学的社会基础做出解释的理论。本研究基于社会认识论,遵循实践导向原则,以用户和记录资源为两个向度,初步划分出图书馆情报学理论视域下的四个具体实践领域,进而通过各层次用户和记录资源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将社会认识归纳为由低到高的四个层次,最终将图书馆体系的本质界定为一种通过结构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化资本互动交汇而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制度安排,并把图书馆情报学界定为以用户和资源作为二维向度,以记录管理和社会认识作为理论支点,以满足不同层次社会认识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科。图2。参考文献33。

关键词 社会认识论 知识交流 记录管理 用户 图书馆本质 图书馆情报学

分类号 G250

The Hierarchies of Social Epistemology and the Essences of Library System

ZHOU Wenjie

ABSTRACT

Social Epistemology, initially developed by Jesse Hauk Shera and some other scholars, aims at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 However, due to deficiencies in the follow-up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of librarianship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al intelligence remain vague. For this reason, the present study aims at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shed light on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LIS based on two basic dimensions for librarianship, patrons and recourse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ivers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of librarianship.

The background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confusion and perplexity that LIS community has experienced in recent years due to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library services leading to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IS lagging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librarianship practice. In order to bridge this gap,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focuses o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social epistemology to clarify the above-mentioned confusion.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信息致贫的微观机理与信息减贫的宏观制度关联研究”(编号:71874141)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A Study on the Synergy of Micro-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Poverty Causation and Macro-system of Information Poverty Reduction” (No. 71874141)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周文杰,Email: wj_lp@sina.com, ORCID: 0000-0001-8001-4530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ZHOU Wenjie, Email: wj_lp@sina.com, ORCID:0000-0001-8001-4530)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patrons and resources could be regarded as two axes to divide the theoretical vision of LIS into four areas. Firstly, those patrons who do not have identified information needs are willing to use the public resources in the library to satisfy the first level of so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needs. Secondly, patrons, who have specific information problems and are willing to access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itially developed for public users but including professional content, meet the second level of so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needs. Thirdly, patrons who focus on specific professional issues but without clear statement on their information need tend to make use of the library retrieval system to meet the third level of so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need. Fourthly, patrons who have identified information problems are willing to seek academic information supporting service from librarians to satisfy the fourth level of so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needs.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process, this article constructed a framework to show how the patrons at different levels interact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s collected by librarians to fulfill the purpose of social intelligence optimization.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that some terminology and ideas come from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which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S well but are unable to be tested by a traditional empirical study, thus,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the Hierarchies of Social Epistemology Theory.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LIS theory and improve professional awareness amongst librarians. 2 figs. 33 refs.

KEY WORDS

Social epistemology.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Record management. Patrons. The essences of library system. LIS.

0 引言

个体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完善机制早已得到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关注,并发展成较系统完善的理论学说。这些学说立足于对知识的本质及人与知识之间关系的揭示,对个体认知发展的过程及其机理进行深入的探索。对于图书馆职业而言,不仅书目控制系统与个体的“认知图式(The Graph of Consciousness)”^[1]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且知识资源的组织整序和提供利用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体认知结构完善化的过程相类似。由此而产生的启示是,图书馆这一“社会装置(Social Apparatus)”^[2]的基本功能与社会认知发展需求之间,应该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关联。美国学者杰西·豪克·谢拉(Jesse Hauk Shera)等所发展的“社会认识论”将

个体与社会的认知活动相类比,回答“社会如何认识它所认识的事物?知识又怎样影响整个社会环境?”^[3]等一系列问题,并为图书馆情报学提供理论基础。

自社会认识论被提出以来,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学者出于廓清学科视域、夯实理论基础等目的,不断对其进行发展完善。然而,由于社会认识过程的动态复杂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和对认识工具的依赖性等诸多原因,迄今为止,社会认识论之于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支撑和图书馆职业的实践指导还比较薄弱。着眼于此,本文基于社会认识论,以图书馆职业面对的不同类型的用户和资源及二者的互动为分析路径,对社会认识的层次结构进行解析,以期对“社会如何借助于图书馆职业的活动而实现其认知结构由低向高的发展”这一问题做出回答,进一步分析图书馆的本质,也为丰富图书馆情

报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努力。

1 社会认识论的源起、主张与基本原理

1950年7月24—29日,谢拉与其同事玛格丽特·伊丽莎·伊根(Margaret Elizabeth Egan)在芝加哥大学主办了书目组织(Bibliographic Organization)会议,并将一篇以《书目控制前言》(*Prolegomena to Bibliographic Control*)为题的短文^{[4]①}纳入了会议议程。谢拉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及这篇文章被认为已经孕育了社会认识论的“种子”^[5]。1952年,谢拉和伊根对其理论进行了拓展,发表了《书目的理论基础》^[6](*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一文,社会认识论由此基本成型。1967年,受阮冈纳赞(Sarada Ranganathan)邀请,谢拉在印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并最终将演讲内容于1970年以《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7](*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为名出版。至此,社会认识论完成了最终的理论建构^[5]。概括而言,社会认识论所主张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5]②}:社会(如同个体一样)需要不断进行知识的采集(Acquisi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而图书馆职业正是这样通过促进人与记录的交流而实现将社会性的行为和思想“绑在一起”的有效中介。社会认识论作为一种聚焦于社会结构中交流思想的生产、流动、整合和消费的学说,为图书馆职业提供了理论基础。站在社会认识论的立场上,图书馆员需要通过分类方案、主题标引、索引和其他对书目单元进行的主题分析,尽最大可能适应用户对记录知识的使用。

综上所述,从社会认识论建构的背景和所主张的理论观点来看,其理论逻辑植根于图书馆关于知识组织(主要是书目控制)的职业活动之中。因此,理解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需要

以知识组织为起点。由于图书馆职业在知识组织方面所做的努力与认知心理学领域关于个体认知发展的理论陈述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因此,个体认知发展相关理论为揭示社会认识的原理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20世纪初,在让·皮亚杰(Jean Piaget)、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S. Bruner)、戴维·奥苏贝尔(David P. Ausubel)等学者的努力下,关于个体认知发展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发展还是经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8]。这些研究对个体认知结构完善化过程及其机理的揭示,很大程度上围绕着个体对于知识的表征和组织展开^[9]。即使只进行简单的类比分析,也可以看出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主张与谢拉基于书目控制而提出的社会认识论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10]。简言之,社会认识的基本逻辑是,图书馆职业借助书目控制而实现知识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个体对知识的编码、分类、信息提取乃至知识的迁移等,因此,图书馆职业基于书目系统的知识分类,与个体的认知过程高度相似^[5]。在社会认识论提出之后的30多年里,谢拉不断提及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并对其加以论证,还分享了与认知心理学家类似的术语(如“同化”)。唯一区别于认知心理学的是,谢拉站在了社会的角度,以图书馆的社会属性为对象展开了理论建构。

在社会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得以建立之后,1976年,谢拉立足于探讨“图书馆学是一门什么学科”^{[3]3},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对图书馆的历史、图书馆与社会、读者与图书、图书馆学教育等问题进行全面解析,出版了《图书馆学引论》(*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本书可被视为谢拉本人借助社会认识论这个理论工具对图书馆职业进行解剖所使用的“手术刀”,是基于社

① 从目前查阅到的文献看,这篇文章发表于1949年。

② 巴西学者 Tarcisio Zandonade 在对谢拉的著述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列出了社会认识论的主要理论主张(详见 Zandonade T. Social Epistemology from Jesse Shera to Steve Fuller[J]. *Library Trends*, 2004, 52(4): 820-821.)

会认识论理解图书馆本质的基石。谢拉在书中指出,学界“没有能够就复杂社会中的智力差别和知识整体做出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研究”^{[3]71},多数研究者虽然对社会认识获得过程中人民群众的行为给予了关注,但都“忽视了使社会结构成形的知识力量”^{[3]71},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的学者需要立足于图书馆职业实践,构建一个“合理的参考框架”,以便观察和了解社会智力的发展进程^{[3]71}。在谢拉看来,理解并促进社会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恰恰是图书馆员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工具的图书馆所起作用的中心问题”^{[3]71-72}。

整体而言,社会认识论将知识的发生、发展、壮大及协调、整序和提供利用置于社会认识的框架之下,并将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知识交流的装置纳入这一框架之中^[11],从而为图书馆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①理论的发展和图书馆职业实践的深化提供启示。那么,图书馆何以能促进社会认识的高级化呢?社会认识论以“交流”作为核心概念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谢拉指出,“交流”一词的含义就是共享,由于交流不仅对人的个性发展十分重要,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也非常重要,所以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3]30}。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社会认识论对于图书馆职业的社会属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由于“知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命题,而知识的“交流”更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因此,迄今为止社会认识论并没有在其理论体系的建设方面做到尽善尽美。例如,谢拉对“知识”的概念界定中表现出的行为主义倾向^②,就被质疑为从操

作主义者(Operationist)或工具的(Instrumental)角度窄化了知识的理解,因此从术语表达上与认识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12]。终其一生,谢拉并没能圆满地回答所有的质疑。1972年,谢拉甚至抱怨道,社会认识论这样的术语虽已得到了广泛接受,但他认为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可能更准确且在这个领域的探究中被应用得更普及^[5]。在另外一些场合,谢拉也曾表露,与讨论社会认识论相比,他更愿意探讨“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5]。

虽然社会认识论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但考虑到概念界定或理论界说本身并不会对图书馆职业的社会属性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对于图书馆情报学基础理论的建设者来说,如果从职业实践层面入手对图书馆的社会基础做出解释,不失为一个主动规避理论分歧,从而将图书馆情报学置于社会认识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可行选择。大致遵循着这个路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立足图书馆职业实践,从“交流”的角度,对图书馆的社会作用进行思考,宓浩、黄纯元等创立的“知识交流论”堪称这种思考的巅峰。知识交流论认为,“图书馆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社会需要”^[13]。“人类认识现象的一个特点是人类总体认识的丰富性、无限性、无穷性寄寓于每个个体认识的狭隘性、局限性和有穷性之中……”“人们依藉着知识的交流促进个体认识的发育,弥补个体知识的差异,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推动新知识的萌芽成长,并使社会知识聚焦成庞大的智力资源”^{[13]7}。因此,“就本质来说,图书馆是社会知

① 迄今为止,图书馆情报学的边界与视域尚存在许多争论,本研究所述的“图书馆情报学”,大致涵盖“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馆情报学”“图书馆资讯学”等内涵类似却名称各异的领域,对应于国外研究者所界定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

② 其中一个例子是,1968年谢拉在学术研讨(详见:Shera J H. 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Library Science[M]//Montgomery E B. The foundations of access to knowledg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1965: 7-25.)及1972年出版的《图书馆职业的教育基础》(详见:Shera H.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M]. New York: Becker & Hayes, 1972.)中指出,社会认识论是“理解社会、国家乃至文化加到自己身上的刺激的手段的研究”。其中,“刺激(stimuli)”一词由于有着丰富的行为主义含义,因此被认为与认识论本身的哲学立场存在不一致。

识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也是社会的、大众的一种认识工具”^{[13]8}。作为社会认识工具的图书馆职业,要实现其职业使命,须从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微观机制(即个体知识交流)入手^{[13]9}。

在笔者看来,图书馆职业之所以能够通过参与社会“交流”而实现社会认识的目标,在于其秉持系统化知识体系的物化形态——记录资源。由于记录资源和用户都存在着层次性,使得社会认识同样具有层次性的特征。每个层次的用户与相应层次的记录资源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认识层级得以提升的动力。记录资源的收集与整理,只是图书馆职业迈向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的第一步。因为读者需要“用力”,方可挖掘到馆藏资源的“启示”^{[3]101},所以图书馆职业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专业化的知识组织与整序,使读者具备从记录资源中相对“省力”地得到“启示”的可能与条件,而对图书馆本质的解析,也需要从用户(读者)和资源(馆藏)两个向度上展开。

2 社会认识高级化的逻辑起点

用户和资源是图书馆职业面对的两个基本要素。在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社区,研究者已发展了多种理论,以期对这两个要素背后的理论问题进行解释。本文将以本领域所发展的基本学说为出发点,为“用户”和“资源”两个向度寻求兼具理论自洽性和学理继承性的理论支点。

2.1 用户向度与社会认识论

作为一种为图书馆情报学提供了丰富理论养分的学说,社会认识论的主要理论创见在于,将原本与个体智力发展密切相关的“认识论”置于一个集体性概念——“社会”的视角之下,从而有效解析了社会依赖于知识传播而获得“社会认识”的机制^[14]。由于图书馆职业面对的用户是一个具有特定社会属性的群体,这一群体作为形塑社会环境的重要参与者,既是推动“社会认识”走向深化的主体,也是“社会认识”成果

的具体传承者。因此,解析图书馆职业的社会属性,首先需要从用户的角度展开。

知识共享是社会认识论的核心,而图书馆职业推动信息(知识)在用户群体之中传播和利用,则是知识共享的重要手段。“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任何一个个体要想获取知识必须从已经社会化了的客观知识世界中去获取”^[15]。社会认识论的创立者谢拉指出,“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者是社会的工具,而且是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65-66}。谢拉进一步指出,知识如何发展和扩大的问题虽然已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但怎样把既有的知识进行有效的组织,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加以利用,却“还是一个几乎未被认识的研究领域”^{[3]70-71}。为此,谢拉认为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重点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各种形式的交流,如何形成、整序、流通和消耗并作用于社会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与社会活动通过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新的知识总体”。社会认识论正是对“(知识与社会活动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所做的新的综合”^{[3]71}。

社会认识论之于图书馆情报学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用以考察“社会智力”发展进程的有效的、合理的参考框架^{[3]71}。在谢拉提出社会认识论之前,图书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者巴特勒(Pierce Butler)就提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而图书馆是将图书内容传播到人们意识之中的一种社会装置”^[2],其思想为谢拉社会认识论的提出和完善提供了启示。谢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们创建图书馆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图书馆对满足社会(认识)的需求负有责任”^{[3]59},作为“社会组织”的图书馆正是为“社会认识它所认识的事物”提供“体制及机构”方面的保障^{[3]63}。据此可见,在社会认识论看来,作为社会中“交流传播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3]244},图书馆职业的主要使命在于满足各种社会认识的需求。

综上所述,如果站在社会认识论的立场上,

本研究把图书馆情报学理论与实践语境下的用户定义为:作为社会装置的(实体或虚拟)图书馆凭借其所拥有的资源,将人类记忆的内容(信息、知识)予以传播的目标人群。这种定义方式,有助于将图书馆职业所面对的用户群体与“社会智力”的获得机理有效加以对接。

2.2 资源向度与记录管理学派

记录管理学派是信息资源管理的三大理论流派之一^[16]。本文选择“记录”而没有使用“文献”“信息”或其他概念,主要考虑是,长期以来,图书馆情报学及相关领域对图书馆的资源基础做出了多种形式的界定,“信息”“信息资源”“文献”“文献信息”等概念都曾在不同的语境下得到了大量应用,但迄今为止很难说已经达成一致。然而,从实践导向来看,图书馆职业所面对的资源基础是确定的,使用何种概念来描述这种资源基础,取决于该概念能否对纷繁的资源特征做出周延的抽象。由于“记录”不必局限于实体形态,相对于“文献”对数字化时代适应性更强;同时,“记录”有确定的形态,相对于“信息”更可把握且更贴近图书馆职业实践。因此,本研究选择了“记录”作为图书馆职业资源基础的描述,而以记录管理学派作为资源向度的理论支点。

按照记录管理学派的理论观点,图书、论文、图片、影像及其他载体记录下来的资料均可被称之为记录。对记录及其蕴含知识成分的收集、整序和利用是记录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而记录管理的目标是在最适当的时间、以最低的费用、给适当的用户以最准确的信息^[17]。谢拉指出,“图书馆一直是担负收集、整理和存贮记录情报以满足读者需要的传统机构”^{[3]123},图书馆员的职责则在于用最适合用户需求的方式向他们提供最佳的馆藏资源^{[3]97},而馆员所从事的,是将读者和记录资料联系起来的工作^{[3]92}。如果将记录管理的目标与图书馆职业活动的价值定位和使命追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以图书馆职业“最简明

的表达”——阮冈纳赞所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18]为例可以看出,记录管理的目标与图书馆职业活动的目标无论是在处理“藏”与“用”的统一性方面,还是在节省用户时间等方面都高度一致。显然,以记录作为图书馆情报学对于信息资源的直观表达,既符合记录管理学派关于信息资源的理论界定,也简明地概括了图书馆职业在资源向度上的主要理论特性。简言之,记录管理学派具备从资源向度为图书馆情报学提供理论支撑的逻辑结构与解释能力。

以记录管理学派作为资源向度上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支撑,有望为图书馆情报学在如下方面留下理论发展的空间:一方面,记录管理学派现有的理论逻辑对于解析图书馆情报学资源向度上的若干本质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图书馆情报学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解决,需要充分汲取记录管理学派的理论养分;另一方面,记录管理学派自身面临的理论体系不够深入和完备的状况,为图书馆情报学有鉴别地建设、完善记录管理学派理论提供了可能。仅仅通过文献调查就可以看出,记录管理学派有诸多可能对图书馆情报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命题,并未在学科理论发展中得到充分重视。例如,记录管理学派特别强调记录的生命周期与管理(也可称为信息过程的管理),这对学科构建和完善信息资源建设相关理论具有重要启示,但迄今为止少有关注。整体而言,记录管理学派以记录的名义,为图书馆职业赖以存在的资源基础划定了明确的边界,从而为图书馆情报学研究聚焦于核心资源及其理论属性提供了一个有价值但尚待完善的参照标准。

2.3 记录管理与社会认识之间的理论关联

回顾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资源与用户在二维向度上为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构建提供了空间,而记录管理学派和社会认识论则为这两个向度提供了基本理论支点。从“图书馆学五定律”到大量图书馆职业实践都表明,资源与用户这两个维度不是相互孤立的,

而是处于永续的双向互动过程之中,而图书馆员则是人与书写记录之间进行互动的有效中介^[19]。这种互动性在图书馆学理论空间的构造中,具体体现为记录管理与社会认识之间的理论关联。依照社会认识论的基本逻辑可见,社会认识论所强调的知识大致对应于传统图书馆情报学所谓的文献(Document)知识,而社会认识论的创始人谢拉甚至直接把这种知识称为“书写记录”(Graphic Record),并指出记录性和可传播性是对“知识”进行界定的重要标尺,而“积累知识,尤其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知识,是图书馆员的任务和首先关心的问题”^{[3]73},实现书写记录的社会功用最大化则是图书馆职业的基本目标^[19]。

按照社会认识论的观点,书写记录是知识传播的主要形式,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基本依托。以图书馆为代表的图情机构,作为对记录资源进行系统性管理的主要社会机构,通过对记录资源的收集、整理以及利用,促进了社会认识走向高级化^①。从社会认识论角度看,图书馆职业所从事的信息组织活动在实现信息整序的同时,也推进了记录所承载的知识信息为社会所认识的过程。为此,谢拉把图书馆以及其他信息中介称之为知识场所(Knowledge - Situation)^[19],并指出,“一个真正的图书馆并不仅仅是在一连串偶然的情况下各种书籍聚集的场所,而是为读者设计的有意义的创作,以促进有目的的思考。”^{[3]101-102}在一定程度上,图书馆与信息系统之间具有很多相似性,这说明知识场所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图书馆与信息系统)是相关的,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显现,知识场所是一个包括主体、媒介物和客体的统一体。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认识论的视域

下,图书馆情报学所研究的信息(或知识)具有相对宽泛的边界。在此图书馆情报学语境中,信息并不一定是符合特定技术标准的、确定成形的、有意义的和真理性的数据资料,而是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各种类型的记录式数据资料或文献^[20],而图书馆除了追求非常确切的信息之外,还有诸多其他职能^{[3]73}。

综上所述,将记录管理和社会认识论作为用户和资源两个向度的理论支点,具有较强的理论自洽性。记录管理与社会认识论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理论关联,对二者的理论观点进行整合可以看出,图书馆职业面对的是由单个个体构成且具有社会性特征的用户群,而图书馆职业所秉承的主要资源则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性“客观”知识记录^[21]。因此,群体性用户的共同认识需求与记录资源之间的关联,为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构提供了空间。总之,记录管理与社会认识之间的融会,为构建统一自洽的图书馆情报学基本理论体系,并据此解释图书馆职业在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逻辑起点。

3 社会认识的层级

前文初步论述了将资源与用户这两个向度置于记录管理和社会认识的理论支点之上的可能性。然而,要洞悉两个向度及其背后的理论支点与图书馆职业之间的适应性,还需关注用户与资源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不仅对于图书馆职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至关重要,对于解决图书馆及类似机构的基本矛盾——“藏”与“用”之间的对立统一,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显然,“藏”与“用”虽然统一于图书馆职

^① “高级化”一词借鉴自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一国的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参见:顾雪松,韩立岩,周伊敏. 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国—东道国”视角的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2016,51(4):102-115)。社会认识论者认为图书馆职业的基本目标是“使书写记录社会功用最大化”(参见:Shera J H. Social Epistemology, General Semantics, and Librarianship[J].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1961, 35(6):770)。本研究认为,这种“最大化”所造成的社会认识水平的分布格局大致类似于三大产业形态由初级向高级发展转化但又同时并存的状况。

业的实践活动之中,但其对立恰恰源于割裂了记录资源和用户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记录与用户本身都具有明显的层级特点,因此,“藏”与“用”之间的互动事实上也常常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为此,要准确揭示社会认识的层次和结构,首先需要对记录资源和用户的类型进行划分。

3.1 记录资源的类型

记录资源既是构成图书馆职业实践的基础,也是图书馆情报学区别于其他学科及其理论范畴的基本边界。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不加区分地使用“信息资源”一词,不仅图书馆情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图书馆机构与其他信息服务机构之间在许多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纠缠不清,而且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内部也常常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如果确认了图书馆情报学科与图书馆职业所面对的主要是以“文献”为主体的记录资源,则不仅有助于图书馆学领域的教育者与研究者廓清本学科的理论边界,也有助于图书馆情报学植根于与图书馆职业实践切实相关的“资源”,从而使学科理论更接近于图书馆职业的实际社会贡献。

基于上述认识,站在社会认识论和图书馆职业实践的角度,可以将以文献为主体的记录资源划分为如下四类^①:①完全公共型记录资源,主要指面向不特定用户且不以解决用户具体的信息问题为直接目的的资源;②专业公共型记录资源,主要指以面向公众用户但以普及专业知识为目的的资源;③普通专业型记录资源,主要指面向特定专业领域的通识性资源,专业基础读物或工具类书籍是此类资源的典型代表;④完全专业型记录资源,此类资源面向高度专业化的人群,学术论文及学术专著是此类资源的典型代表。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对于记录资源类型的

划分,是从社会认识论和图书馆职业相结合的角度对记录资源进行合理抽象而获得的一种认识结果。这种分类的目的,仅仅是通过对记录资源的内容进行层级的区分,以体现社会认识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进而为阐释图书馆职业的价值提供理论建构的空间。因此,这种分类方法与具体实践中对图书馆体系所拥有资源的分类有一定的区别(当然,图书馆的某些设置也可以与上述分类部分对应,如普通阅览室和专业阅览室)。因此,上述记录资源的类型划分并无绝对标准,所划分的各类型之间也并非完全独立,且同一类记录资源很可能对应着不同需求的用户。之所以对记录资源进行上述分类,是为了对社会智力的内在结构及其形成机理的解读提供便利。

3.2 用户的类型

用户不仅是社会认识的主体,也是图书馆情报学理论建设与图书馆职业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关于用户信息实践特征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关注的重要领域。事实上,无论是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构建还是图书馆日常服务实践活动,离开了对用户的把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据图书馆用户的知识结构,可将其大致分为大众用户和专业用户;进而再根据用户的信息问题是否明确将其分为信息问题规则用户和信息问题不规则用户。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情况,图书馆情报学视域下的用户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

(1)无明确信息问题的大众用户。指接受图书馆职业的服务,却并不以明确的信息需求满足为直接目标的用户。例如,仅仅是为了娱乐或消遣而接受图书馆服务的用户。

(2)有明确信息问题的大众用户。此类用

^① 在图书馆情报学领域,类似的分类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如,1941年拉尔夫·A·比尔斯将所有图书馆文献分为喜讯型、论证型和研究型三种(详见:拉尔夫·A·比尔斯.传播学研究对公共图书馆的意义[M]//道格拉斯·韦普尔斯.民主社会中的出版物、广播与电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2:165-166.本文转引自:杰西·H·谢拉.图书馆学引论[M].张沙丽,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198.)

户有明确的信息需求,期望通过接受图书馆服务而解决信息问题。例如,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用户,为了解某种疾病而查阅图书馆的医学资源。

(3)信息问题不规则的专业用户。不规则信息问题是一个与知识非常态^①(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相类似的概念。此类用户首先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但其接受图书馆服务的首要目标并不是解决当下所面临的信息问题,而是了解一些通识性的专业知识。例如,一位入门级的研究者,为了解和学习本领域的一般状况而进行资料查询或信息获取。

(4)信息问题规则的专业用户。此类用户是指那些确知并能够清晰表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信息的用户。此类用户所面临的信息问题主要是清晰而具体的专业问题,也就是说,具有专业背景的用户因在具体专业问题上存在无法自我解决的信息问题,从而查询相关记录资源。最典型的是学术研究人员查询本学科的专业学术论文或接受图书馆提供的深度学科情报服务。

基于上述分类,在联系图书馆职业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图1所示的图书馆情报学元理论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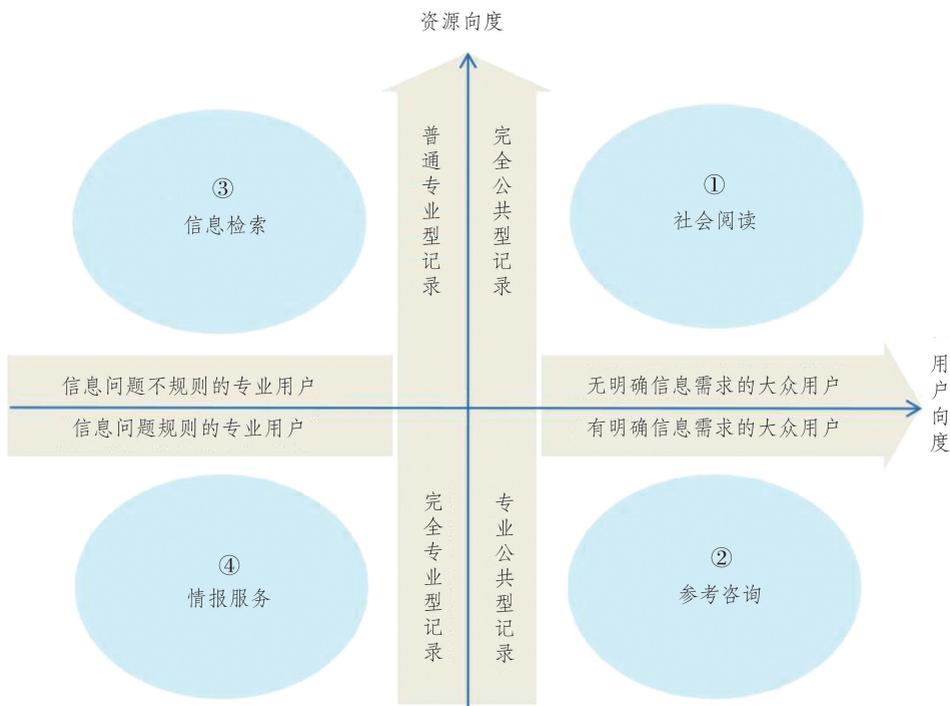


图1 基于用户和记录分类的图书馆情报学元理论框架^②

^① 知识非常态概念由英国学者贝尔金提出。贝尔金认为,用户之所以存在认知失衡,是由于其知识结构面对特定问题存在欠缺,而由于用户对需求内容“未知”,虽然用户都感知到信息需求的存在,却只能进行模糊的表达(详见 Belkin N J, Oddy R N, Brooks H M. ASK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Pars I & II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38(2): 61-80.)

^② 本框架下的“信息检索”不仅包括对图书馆馆藏目录系统的查询,更侧重于基于图书馆平台而展开的知识单元层次上的查询。

3.3 知识场所——基于场域的理解

用户和记录资源是图书馆职业面对的两大核心向度,但借助于记录资源对用户的认知或行为进行干预却只是图书馆职业一个潜在的功能^[10]。虽然图书馆体系之于社会认识的作用是通过不同类型的用户与资源之间的互动而实现的,但现实世界中具体记录资源和用户并非都可以绝对归入某种特定类型。而且用户与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隐性的,也无法通过具象的分类完全表达出来。为避免对记录资源和用户因人为划分而可能造成的割裂,就有必要借助“场域”的概念,实现对图书馆所代表的记录资源密集、知识互动频繁的知识场所的抽象化,以期使基于不同类型用户和资源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构建的理论体系内涵更加周延。

场域(Field)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与前文所提到的谢拉所述的场所或情境(Situation)具有很高的可类比性,但理论上更加完备。布迪厄指出:“我将一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22]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能理解为被一定边界包围的领地,也不等同于一般的领域,而是在某种内在力量(如文化)约束下形成的有活力的社会存在。布迪厄研究了许多场域,如美学场域、法律场域、宗教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每个场域都以一个市场为纽带,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结起来。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越是自主的,这个场域的生产者只为本场域其他生产者生产而不为社会场域的消费者生产的程度越大。这样来看,自主性最强的场域是科学场域,其次是高层次的艺术场域,相比之下,法律场域较少自主性,而自主性程度最低的是政治场域。

图书馆的用户总是处于一定的场域之中。根据图书馆职业实践,并结合布迪厄关于场域的理论陈述,可以将图书馆用户置于不同层级的场域之下。

①低自主场域。从用户向度看,这一场域涉及的主要是没有明确信息问题的大众用户;从资源向度看,这一场域涉及小说等以娱乐、消遣为目标的完全大众型记录资源。可见,在这一场域中,记录的生产者(如小说作者)与使用者(读者)之间完全分离,因此,这一场域是缺少自主的。

②高自主场域。与低自主场域不同,当有用户求助于各种专业记录满足其信息需求时,需要在专业资源上附加个体的先验知识才能理解和消化这些资源,因此,这些知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统一。也就是说,用户对专业资源的使用过程,事实上是一个对专业资源依据个体先前的知识储备进行“再加工”的过程,因此,与娱乐性的阅读行为相比,基于专业记录开展的认识活动自主性更高。特别是当研究人员以知识创新为目标进行学术文献的阅读时,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几乎完全重合起来,此时,场域的自主性显然很高,可被界定为高自主场域。

③自为场域。从发生学角度看,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个体自觉水平上自发形成的结构,另一种是在群体自觉水平上自觉建立的结构”。“社会系统的自为控制是社会自觉建立结构的一种功能,是群体自觉活动的产物,是社会群体主动追求的结果”^[23]。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主动建立且充斥着群体性知识交流活动的组织,显然属于自为的社会结构。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看,理想状态①下的图书馆系统因有效整序了大量“记录知识”并满足了社会认识

① 对图书馆这种理想状态的描述,渊源于谢拉的相关著述。例如,谢拉在对图书馆和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进行比较后指出,“大众传播工具可能要迎合文化水平最低的人之所好,而图书馆则以最高水平为目标”(详见杰西·H·谢拉.图书馆学引论[M].张沙丽,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6:95)。据此可见,谢拉认为,作为“知识场所”的图书馆虽然可以涵盖各种层次的知识交流,但服务于“最高水平”的知识交流却是其最终的职业追求。

的发展需求,从而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自为场域。这是因为,“随着记录知识的信息载体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人们才打破了自身的束缚,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创新的‘自在者’,自如地浮游在知识海洋中,广泛地汲取知识养料”^[24]。自为场域之所以高于高自主场域,是由于场域的自主度取决于记录资源的生产与消费过程的契合度,但即使在高自主场域,用户仍处于信息(或知识)需要(或创新)的“压迫”之下。也就是说,高自主场域下的用户,具有明显的功利性——为信息需求的满足或新知识的生产寻求解决方案。而当这些用户从具体的信息(或知识)生产的任务下解放出来,“自由”地遵循自己的思想去理解和解释身边的世界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自为的场域。在自为场域中,用户

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信息需求或知识生产任务,但却很可能(但非必然)出现高度的思想创新或其他高质量的知识生产行为,其行为和认知具有高度自主性、灵活性乃至随意性。

3.4 记录资源与用户的互动

在诸多关于个体发展的理论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创立的需求层次理论。既然图书馆的创建也是满足社会“智力发展”的需要,则社会认知需求与个体需求之间就具有了一定的可类比性。据此,参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25],根据不同类型记录资源和用户之间的互动性,将其整合为一个社会认知需求在四个隐性层级上逐次得以满足并最终转化为显性知识场所的理论框架(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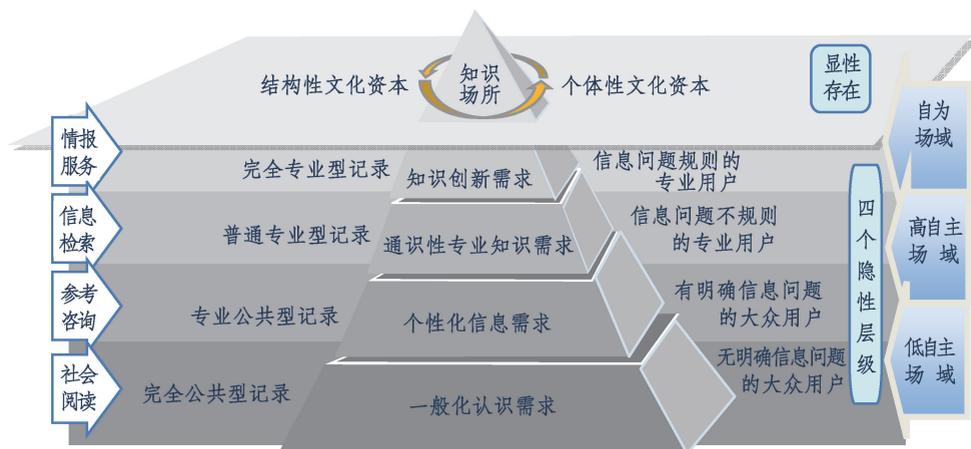


图2 记录、用户、场域与社会认识的需求层级

如图2所示,在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视域下,社会认识高级化的过程(即隐性阶段)主要由如下四个层次的认识需求构成。

第一层次,一般化认识需求。在这个阶段,社会认识处于一种无明确知识(信息)需求的状态,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在此阶段的职业使命仅仅是满足用户娱乐身心、文化体验等一般性的认识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由于对用户的信息素养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反映了社会认识的初始阶段。

第二层次,个性化信息需求。许多研究都表明,能否敏锐地发现自己的信息需求是影响个体信息贫富状况的重要指标^[26-27]。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提出明确信息问题的用户显然在认识的层级上高于无明确信息问题或不能意识到自己信息需求的用户。考虑到这一点,个性化信息需求是比一般性认识需求更高一级的需求。在这个层次上,图书馆职业的使命在于,从制度安排的层面,保障不同层次信息需求的大众用户都能够得到资源的保障。

第三层次, 通识性专业知识需求。现有研究普遍认同, 知识源于信息又高于信息, 是一种经过对信息进行理性加工而获得的见解、认识^[28]。由于知识须经主体的认知努力方能获得意义, 因此, 知识需求的层级要高于信息需求, 从而使专业人员获取相关专业领域通识性知识的历程在认识的层次方面高于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在这一层次, 图书馆职业的使命在于, 通过系统化的知识组织, 使专业知识能够按照最符合人们认知结构的方式加以呈现并提供利用(主要指图书馆领域内基于知识单元的信息检索)。

第四层次, 知识创新需求。当用户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对记录资源加以使用时, 用户事实上在对记录资源进行一种“再生产”的活动, 此时, 认识层次显然高于之前各阶段。在这个层次上, 图书馆职业不仅仍然从事着系统化的知识组织和信息检索任务, 更重要的是, 以专业化的手段展开深度的知识咨询与科技情报服务。

3.5 作为显性知识场所的图书馆

在图书馆职业的参与下, 社会认识的各层次呈现出一种由低向高逐次递进的格局。当社会的认识需求从第一层级到第四层级逐步得到满足时, 图书馆在社会认识中的作用发生了质变, 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显性存在层次), 即图2所显示的“知识场所”。也就是说, 在知识场所之中, 无论原生知识还是新生知识都变成了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存在于实体或非实体的图书馆及其他具有类似职能的社会机构之中, 并为社会认识的深化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例如, 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 就是一个存在了两千余年的泛在知识场所, 而图书馆作为儒家典籍的收集、整理与提供利用者, 就成为这个知识场所的显性实体存在。由于“文化”是一个不可见的抽象概念且其外延非常宏大, 而且图书馆职业显然也并非社会性的制度安排中唯一的“文化机构”, 因此, 在知识场所中, 只有文化的物化形态——记录资源才是图书馆职业工作的对象。也就是说, 只有记录资源中被收集、整

序和利用的部分才与图书馆情报学的基本理论和职业实践相关联。对于图书馆职业来说, 层次化的社会认识如同大海中的一座冰山。除知识场所的显性化阶段外, 社会认识的其他四个层次都隐藏于“海平面”之下。图书馆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场所”的主要显性存在, 是因为图书馆职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已经先天地被赋予了知识保存、整序与利用的社会职能, 从而在知识场所显性化的过程中居于支配性的主导地位。

实际上, 作为“知识场所”显性存在的图书馆, 并非指某个或某种特定的图书馆, 而是指一个由不同类型的实体或虚拟的图书馆构成的系统。“没有哪个图书馆员能拥有一切图书, 也没有哪个图书馆能满足一切需要”^{[3]79}。因而, 图书馆事业是一个由众多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的因素统一协调而构成的有机整体。由此可见, 一个由类型各异、功能互补的各种实体图书馆共同组成的图书馆体系才能接近于构成“知识场所”。事实上, “知识场所”是图书馆职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这一理想目标达成的过程, 恰恰是不断完善的社会“认知结构”^[29]物化于图书馆这一制度化的机构之中的过程。

文化是社会认识论得以构建的基石。作为知识场所显性存在的图书馆, 是一个文化濡染的社会公共空间, 是结构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化资本产生互动的主要接口。所谓结构性文化资本, 大致类似布迪厄关于“制度性文化资本”^[30-31]的概念, 主要指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的图书馆为社会成员赋能(Enable)的过程, 是社会为保障其成员文化发展进行制度性安排的最终后果。各种记录是图书馆服务所秉持的主要资源, 而这些记录资源的主要职能, 则是波普尔(Karl Popper)所述的“世界三”^[32]——客观的知识世界的具体承载。之所以称之为“结构性”, 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装置”的图书馆, 源于社会结构, 决定于社会结构, 并服务于社会结构。站在图书馆职业的立场上, 结构性文化资本是结构性记录资源的资本化, 反映了一个社会占有的公共知识的总量及

这些公共知识融入整体民众的程度。所谓个体性文化资本,则大致等同于布迪厄“内含性文化资本”^[22-23]的概念,是一种习得的文化资本,是个体通过与环境(知识场所)之间的互动,通过认知建构而获得的文化资本,其结果是个体的智识(或信息素养、认知地图)。

作为显性的知识场所,图书馆职业的价值在于承接并推动结构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化资本之间的对接与互动。针对结构性文化资本,图书馆职业主要通过收集(如采访)、整序(如分类或编目)等专业活动,为记录资源被纳入个体性文化资本做好准备;针对个体性文化资本,图书馆职业主要通过知识组织等专业活动,为个体认知活动与记录资源的对接提供接口。两种文化资本之间的互动结果便是社会认识论所强调的知识信息的共享,也是图书馆作为显性知识场所以得以存在和成长的根本依据。

由此来看,很多图书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产生,常常都源于隐性层面上用户与记录之间互动关系的断裂,进而导致结构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化资本之间无法有效对接。例如,“藏”与“用”之间的矛盾。“藏”的底层,是各层次的记录资源及其特性;“用”的底层,是各层次用户的需求特性和认知准备。在每个层次上,“藏”与“用”之间都存在着潜在的互动。当这种互动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则意味着该层级上的社会认识需求得到满足;反之,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与图书馆职业实践则遭遇障碍。对于社会认识的过程来说,只有当较低层级的社会认识需求得到满足,才可能进化到较高层级的社会认识需求层级。可以认为,由公共图书馆到专业图书馆,是一种社会认识需求由低到高逐次得到满足的过程。作为知识场所以显性化的图书馆,是一个

旨在实现不同层次社会认识需求的制度安排链条,而非一个个能够独立完成社会认识任务的实体机构。由此可见,图书馆系统本质上是一种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制度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职业要想建成一个能够完美对接结构性社会资本与个体性社会资本的知识场所,则需要建成一个从公共到专业的图书馆制度化链条,这个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导致图书馆职业无法达成其终极职业目标。

4 图书馆的本质

社会认识论从“社会智力”发展的角度,为解析图书馆这种“社会装置”的本质提供了逻辑起点,而知识交流论则为理解图书馆职业参与社会智力发展的机理提供了参照。为了深入考察社会认识发展的过程与结构,本研究围绕知识交流这一核心,对不同类型用户和记录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了解析,将图书馆体系的本质界定为一种通过结构性文化资本与个体性文化资本互动交汇而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制度安排^①,并把图书馆情报学界定为以用户和资源作为二维向度,以记录管理和社会认识作为理论支点,以满足不同层次社会认识需求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科。

知识交流论的创立者宓浩指出,“任何一门科学从来不把它的理论基点建筑在现有的社会实体的表面活动上,而是深入到制约这种社会实体活动的社会联系的本质基础上”^{[24]13}。因而,揭示图书馆这种社会实体的本质,需要超越图书馆的表面活动。“交流”是社会认识论和知识交流论共同采用的核心概念,也是深入解读制约图书馆职业活动社会联系的基本理论工

^① 图书馆作为一种制度化安排的社会机构思想,蕴含于芝加哥学派。黄纯元在对芝加哥学派进行系统评述后曾指出,当“社会的、文化的交换(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发展到“系统化、规模庞大、复杂”的“知识转移”阶段时,“社会就需要图书馆这样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机构来促进交换的完成”(详见黄纯元.论芝加哥学派(下)[J].图书馆,1998(2):9-12)。虽然谢拉并没有专门论述过图书馆到底应该是制度还是机构,但考虑到谢拉与芝加哥学派之间的学术渊源和图书馆事业在信息化时代新的发展特征,本文认为,将图书馆视为制度安排更贴近社会认识论者的理论立场。

具。但是,由于“交流现象比单独对知识进行研究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因此,“对交流现象进行研究的途径”从一定程度上被早期的社会认识论者所“忽视”^[33]。本研究站在了图书馆职业实践的立场上,将不同类型的用户及其与不同内容属性的记录资源之间的互动进行对应分析,试图为“交流”赋予实质性内容。同时,本研究基于不同层级用户与记录资源之间的互动解析社会认识的内在结构,为透过“交流”而揭示图书馆职业活动社会联系的本质提供了可能。将图书馆本质归结为保障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制度安排,正是基于上述逻辑而展开理论演绎的结果。

将图书馆职业的最终使命定位于通过参与社会交流而促进社会认识的高级化,兼具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藉由参与“交流”而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赋予了图书馆职业一种“因变而变”的权利和可能。换言之,这从本质上要求图书馆职业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应当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不断走向高级化的社会认识就如同社会经济发展中不断走向高级化的产业结构一样,将永不停息地产生出新的需要,而图书馆职业只有对接这种需要,才会永葆青春和活力。另一方面,从社会认识高级化制度保障的角度认识图书馆,有助于将图书馆的本质与因交流工具、技术的变化而导致的职业活动形式的变化区别开来,从而使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发展能够适度超然于图书馆职业领域技术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说,只有做到了这种适度超然,图书馆情报学的理论建设进程才能持续,图书馆职业实践才不会因理论的迷失而丧失前进的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认识论与知识交流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认识”与“知识”作为社会认识论与知识交流论分别采用的基本概念,恰恰是二者理论建构立足点的差别所在。社会认识论内在地把图书馆职业的活动看作一个动态的“认识”过程,而图书馆则被视为促进社会认识高级化和社会智力水平提高的“器官”;相对应地,知识交流论更强调图书馆职业

对以文献记录为载体的“知识”进行序化整理,以备为社会所认识。整体来看,社会认识论更强调在社会结构的形塑过程中,图书馆职业如何通过参与社会认识而对其发生影响,这是一个从社会到图书馆的视角;而知识交流论更强调,图书馆职业如何通过知识的整序而为社会认识高级化做好准备,这是一个从图书馆到社会的视角。换言之,社会认识论强调的是社会如何应用知识而实现认识的高级化,而知识交流论则强调知识的保存与整序者应该如何做好准备以便使知识资源被社会所认识。可见,社会认识论所重视的,是“社会智力”的形成过程,而知识交流论则更重视社会基于其“交流”而最终获得的“知识结构”本身。本研究所秉持的基本立场是,社会认识论和知识交流论之间的差异,不仅不会导致理论区隔,而恰恰实现了相互弥补。正因为如此,对图书馆本质的解析,需要兼顾二者,而不是偏废其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的展开,可被视为一种尝试站在社会认识论者和知识交流论者所创立的理论高峰上,为丰富和发展图书馆情报学基本理论而做出的努力。

5 小结

本研究遵循实践导向的原则,通过社会认识论的视角,针对不同类型的用户与记录资源之间的知识交流展开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图书馆的本质展开了讨论。

本研究所构建的社会认识层次性框架虽然初步做到了理论上的自洽,但相对于信息社会背景下图书馆职业面临的深刻变迁,本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诸多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尚需后续研究的持续跟进。诸如,在社会认识的每个层次上,用户与记录资源之间互动的机理是什么?除去图书馆职业关于记录资源组织与整序的努力,社会认识高级化的其他条件还有哪些?等等。此外,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本研究借用了来自哲学及社会学领域的若干概念,后

续研究中,尚需对这些概念及其在社会认识层次理论框架中的效度做出进一步检验。

致谢:本文的主要观点分别在2017年10月28日“2017年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湘潭大学)、2018年3月10日“‘融合与创新:新

技术环境下图书馆学知识体系重构’暨南京大学首届青年图书馆学学者论坛”和2018年7月6日“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演讲,与会学者的讨论使笔者获得了对理论框架进行修正、完善的诸多启发,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1] Piaget J. The graph of consciousnes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1.
- [2] Butler P.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23.
- [3] 杰西 H 谢拉. 图书馆学引论[M]. 张沙丽, 译.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6:71. (Shera J H.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 Zhang Shali, trans.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1986:71.)
- [4] Egan M E, Shera J H. Prolegomena to bibliographic control[J]. Journal of 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1949, 5(2): 17 - 19.
- [5] Zandonade T. Social epistemology from Jesse Shera to Steve Fuller[J]. Library Trends, 2004, 52(4): 810 - 832.
- [6] Egan M E, Shera J H.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J]. Library Quarterly, 1952, 22: 125 - 137.
- [7] Shera J H.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M].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27-165.
- [8] 施良方. 学习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227. (Shi Liangfang. Learning theory [M].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94:227.)
- [9] Guthrie R, Powers F F. Educational psychology[M].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0:126.
- [10] 周文杰. 走向用户中心: 公共图书馆体系对个体发展影响的理论解读[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7, 26(1): 47-56. (Zhou Wenjie. Towards user-centeri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public library system upon individuals'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7, 26(1): 47-56.)
- [11] Shera J H. The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M]. Asia Publishing House, Bombay, India, and New York, 1970:29.
- [12] Budd J M. Jesse Shera, sociologist of knowledge?[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02, 72(4): 423-440.
- [13] 黄纯元. 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1. (Huang Chunyuan.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the science for communication[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7:1.)
- [14] 丁五启. 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认知基础——耶希·霍克·沙拉的社会认识论构想[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5): 23-26. (Ding Wuqi.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hera'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pistemology[J].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2006(5): 23-26.)
- [15] 王子舟. 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4): 7-12. (Wang Zizhou. On knowledge set: exploring on objects of Library Science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0(4): 7-12.)
- [16] 朱庆华, 赵宇翔, 吴克文, 等. 信息系统学派视角下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进展和思考——基于IRMJ的元分析[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11(1): 39-49. (Zhu Qinghua, Zhao Yuxiang, Wu Kewen, et al.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flection on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under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system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1(1): 39-49.)
- [17] 于红梅. 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学派概述[J]. 图书馆建设. 2005(6): 26-28. (Yu Hongmei. Sketching on the theory school of foreig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5(6): 26-28.)

- [18] 阮冈纳赞. 图书馆学五定律[M]. 夏云, 等, 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402. (Ranganathan S R. The 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M]. Ya Yun, et al. trans. Beijing: Bibliographic Press, 1988: 402.)
- [19] Shera J H. Social epistemology, general semantics, and librarianship[J].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1961, 35: 770.
- [20] Floridi L. On defin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s applied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J]. *Social Epistemology*, 2002, 16(1): 43 - 46.
- [21] 吕乃基. 三个世界的关系——从本体论的视角看[J]. *哲学研究*, 2008(5): 107-114. (Lü Naiji. Relations among world1, world2, and world3—comment in terms of ontology[J],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2008(5): 107-114.)
- [22] 田耕. 社会学知识中的社会意象——Doxa 概念与布迪厄的社会学知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5(1): 60-83. (Tian Geng.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ocial within sociological knowledge: Doxa and Bourdieu's knowledge theory[J],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5(1): 60-83.)
- [23] 杨桂华. 论社会系统的自在控制和自为控制[J]. *哲学研究*, 1998(8): 59-65. (Yang Guihua. On the self-being and self-making of social systems[J].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1998(8): 59-65.)
- [24] 宓浩. 图书馆学原理[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13. (Mi Hao. *Principals of Library Science*[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Press, 2013: 13.)
- [25] 胡家祥.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J]. *哲学研究*, 2015(8): 104-108. (Hu Jiaxia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on Maslow's theory of hierarchical needs[J], *Philosophy Research*, 2015(8): 104-108.)
- [26] 于良芝. “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及阐释[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39(1): 4-12. (Yu Liangzhi.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the discovery and exposition of a concept for information inequalit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 39(1): 4-12.)
- [27] 于良芝, 周文杰. 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 个人层次的信息不平等测度述评[J]. *图书与情报*, 2015(1): 53-60. (Yu Liangzhi, Zhou Wenjie. Information rich and poor: review of the information inequality measurement[J]. *Library & Information*, 2015(1): 53-60.)
- [28] 于良芝. 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5. (Yu Liangzhi.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6: 5.)
- [29] Ausubel D P. The use of advance organizers in the learning and retention of meaningful verbal material[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60, 51: 267-272.
- [30] 李煜. 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J]. *社会学研究*, 2001(4): 52-63. (Li Yu. Cultural capital, diversity of the culture and social network capital[J].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1(4): 52-63.)
- [31] 仇立平, 肖日葵.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6): 121-135. (Qiu Liping, Xiao Rikui. Cultural capital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in Shanghai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6): 121-135.)
- [32] 卡尔·波普尔. 客观知识[M]. 舒炜光, 卓如飞, 周柏乔, 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44. (Popper K. *Objective knowledge* [M]. Shu Weiguang, Zhuo Rufeifei, Zhou Baiqiao, et al,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144.)
- [33] 刘伟. 图书馆学的理性基础: 谢拉的回答——评《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原理》[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1(1): 57-58. (Liu Wei. The rational found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an reply from Shera; review on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1991(1): 57-58.)

周文杰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甘肃 兰州 730030。

(收稿日期: 2018-12-24; 修回日期: 2019-01-09)